

当代中国

哲学丛书

内圣外王之道

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

郑 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



哲学丛书

内圣外王之道

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

郑 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圣外王之道: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郑臣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ISBN 978-7-208-12523-0

I. ①内… II. ①郑… III. ①程颢(1032~1085)-
哲学思想-研究 ②程颐(1033~1107)-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155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设计 王小明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内圣外王之道

——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

郑 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 字数 337,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523-0/B·1086

定价 55.00 元

总 序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1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的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

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2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意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心魄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

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会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3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下一世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Abstract

The main topic of this book is studying on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Sageliness within and kingliness without) in the horizon of philosophy of praxi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Concept, "Neisheng-waiwang" (Sageliness within and kingliness without), expresses the core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thoughts. It is often used to manifest Confucian's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 and embody Confucian's practical spirit.

As forerunners of the Song Neo-Confucians and ancestors of Cheng-Chu school, the Two Cheng brothers generalize their thoughts as "Neisheng-waiwang", while they struggle with Buddhism and Wang An-shi's "Jinggong-Xinxue" in theory. Their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base on the doctrine of "liyi-fenshu" (the principle is one, its manifestation are many), and take "ti-yong yiyuan, xian-wei wujia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ere is no gap between the manifest and the hidden) as guideline.

The book illuminates that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found on the theory of Hsin (Mind) and Hsing (Nature), and aim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ideal of "Kingly Way Politics". They take "Neisheng" (Sageliness within) as root, and "Waiwang" (kingliness without) as tip; take "Neisheng" as beginning, and "Waiwang" as end; take "Neisheng" as substance, and "Waiwang" as function.

As we all know,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praxis is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praxis. Praxis is a key concept of Aristotle's philosophy. Praxis, is just action, means that ethical and political ac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productive labor or making in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praxis. So, ethics and politics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praxis.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praxis cares about the 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through thinking of Good, and researches on the basic realm of the meaning of the human's existence. It points out the political origin of moral actions, and the moral meaning and moral purpose of the Politics. And it expounds that moral and politics are unified.

The book illuminates that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are not only put forward Confucian classical thought, but also manifest spiritual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as philosophy of praxis. Not only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discuss mainly the relation of moral and political, but also care about all kinds of actions of the human being in the family, nation and world. In the end, it researches on the basic realm of the meaning of the human's existence.

All in all, the book clarifies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and manifests spiritual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as philosophy of praxis finally.

目 录

总 序.....	1	1
导 论.....	1	
第一章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渊源	23	
第二章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传统的兴衰流变	54	
第三章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78	
第四章 二程思想的异同与宋明儒学的分派.....	110	
第五章 程明道的内圣外王之道.....	121	
第六章 程伊川的内圣外王之道.....	165	
第七章 二程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要义和历史意义.....	235	
第八章 西方实践哲学的思想视域.....	261	
第九章 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	292	
第十章 儒学的精神特质及其当代意义.....	311	
附录:二程研究综述	338	
参考文献.....	355	
后 记.....	380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1
I . The Origin of Confucian Thought of "Neisheng-waiwang"	23	
II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onfucian Thought of "Neisheng-waiwang"	54	
III . The Two Cheng Brothers in th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of the Song Confucianism	78	
IV .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ademic Schools of the Neo-Confucianism	110	
V . Cheng Ming-tao'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121	
VI . Cheng I-chuan'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165	
VII . The main Idea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Cheng Brothers' Thoughts of "Neisheng-waiwang"	235	
VIII . The Horiz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Praxis	261	
IX . The Two Cheng Brothers in the Horiz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Praxis	292	

X.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311
Appendix: The Research Summary about the two Cheng Brothers	
.....	338
Bibliography	355
Postscript	380

导 论

一、儒学的精神实质：“内圣外王”

1

自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不过短短百余年的时光，近代中国不仅遭遇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接踵而至的社会政治变革，更经历过中西体用之争、维新与保守的对抗、改良与革命的交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冲突、方法与主义的论辩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运动。

在西方文明暴风骤雨般的强势冲击和资本主义惊涛骇浪似的狂暴席卷下，近代的中国如大厦之将倾，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摇摇欲坠，随时有崩溃坍塌的危险。一面是社会政治上的剧烈动荡，一面是思想文化上的猛烈冲击，古老的中华民族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好似一个酣睡已久，美梦还未做完却忽然被惊醒的老者，在十分不情愿地睁开了睡眠惺忪的双眼后，又在迷糊恍惚之中被当头棒喝，在迷茫困惑中早已被惊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应该走向何方了！

在这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危局中，国人在不断地反思、责问和追寻中探索新的出路。从最初对西方文明的不屑一顾，到对之如洪水猛兽般地高度戒备防范，再到不堪一击、一溃千里后的恐慌畏惧，直到最后敬若神明般地顶礼膜拜，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奇妙变化。就这样，一方面是拿来主义，从直接购买船炮车炮、引进机器，到兴办工厂学校、学习技术，再到变法革新、照搬制度，曰

求新、曰求变，可谓乱花迷眼，困惑不堪，只为开辟新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则是批判传统，从批判科举八股、三纲五常，到批判君主专制、封建礼教，再到否定古文、抛弃礼乐，曰封建、曰守旧，可谓不遗余力，鞭辟入里，只为甩掉旧的包袱。

自然，这不仅仅是为过往的失败寻找借口，更是为当下的生存和将来的发展寻求理由。而清末以来的近代中国，其所面对的危机远胜以往——中华不仅有亡国灭种之虞，更有文化灭绝之忧了。在这样一个以救亡图存、取新代旧为主题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感到西风东渐如杯水车薪，难成气候，如不破旧立新，另起炉灶恐怕已无补于事了。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人们不断地反思和批判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体的儒学自然难辞其咎，难逃责难。就这样，曾几何时，儒学非但不再居庙堂之高，也不再蔚为显学，而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原罪，几乎被国人弃之如敝屣，甚至要被逐出国门了……

2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虽然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过去已经百年左右，即使“文革”时期也离我们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我们现在仍然要从根本上追问，儒学的根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它的思想特质又是什么？它所遇到和面对的内在问题和困境又在哪里？它对当代的生活世界和社会文明还具有哪些意义和价值？它对于人们当今和未来的生存还能否继续发挥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

事实上，自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成为两汉的国策。其后虽经历三国魏晋南北朝，玄学清谈之风兴起，儒学中衰；至中唐以后，韩愈、李翱等大倡古文运动，力排佛老，儒道稍振；然唐祚不长，五代十国迭相更替，纲常大乱，儒道复湮；逮至赵宋，偃武修文，儒学中兴；南宋理宗以后，程朱理学更是成为官方正统，终元、明、清三代，设科取士，以此为准则的。其间虽有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宋明的理学心学之争，清代的汉学宋学之争，但均属儒学内部的学派争议，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儒学是什么的疑问。

《四库全书》总叙古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兴衰演变，谓：“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不过汉宋两家，互为胜

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也就是说,在汉代儒学独尊,蔚为显学,成为官方统治学说之后,儒学思潮虽然经历过六次大的演变,但归根结底也不过是汉学、宋学两大思想学派之间争长论短、争强斗胜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对儒学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实质进行根本反思的并不多见,而敢于质疑儒学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就更加寥若晨星了。

要弄清楚儒学是什么,自然要先考察一下“儒”与儒家的来源。考“儒”之起源,一般认为出于殷商时期主管祭祀礼仪的术士。^[1]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最早明确地将“儒”定义为术士。近代的章太炎在《原儒》一文将“儒”分为“达”、“类”、“私”三科,“达名”的“儒”泛指一切方术之士;作为“类名”的“儒”则指专以“六艺”教民的“师儒”;而私名之“儒”即后来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儒”。

随后胡适于1934年发表《说儒》一文,更是提出了一个极创新而大胆的假说。《说文》认为“儒”最初是“殷的遗民”,是“殷民族的教士”。殷亡于周后,这些殷的遗民以司礼为职业为周人服务,以恭敬守柔处世,并时刻不忘复国。而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改造为“仁以为己任”的“儒”,“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因而代表了殷民族复兴之要求,而被认为是殷民族的“救世主”。胡氏之说虽非无据,然论证并不严密,论据并不充分,更多的是出于想象和附会,遭到了后来冯友兰的《原儒墨》和郭沫若的《驳〈说儒〉》等文的批驳。后来徐中舒于1975年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就根据甲骨文证实“儒”在殷商时代的确就已经存在,不过他们不是殷亡后试图复国的殷民族的后裔,而只是在殷代主管祭祀等礼仪的人。“儒”的本义应该是“濡”,即沐浴濡身的意思,因为他们在主持礼仪的时候必须经常斋戒。^[2]李泽厚亦认为,“‘儒’、‘儒家’之‘名’虽晚出,但其作为与祭祀活动(从而与礼)有关的巫、尹、史、术士……之‘实’却早存在”,因此他得出结论,以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礼仪’的专

职监督保存者”^[3]。现代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沐浴濡身的“濡”并不必定与后世所谓的“儒”相关,“儒”之本义应为以道艺濡人之人。^[4]同样,也有学者根据《周礼·大宰》所说“儒以道得民”和郑玄所说“儒,六艺以教民者”,认为“儒的特征是以六艺教人”^[5]。张东荪便以为,“儒”在孔子以前就有的,“凡通习六艺者谓之‘儒’,又称之为‘术士’,大概是一种职业,即以六艺教人者。”^[6]

尽管学界对于“儒”的起源存在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那就是不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还是“以六艺教人”的师儒,也不论它起源于主管祭祀活动的术士,还是起源于“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王官(《汉书·艺文志》),儒家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团体,担负着社会政治教化的使命和职责,因而从其发源处便与社会政治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社会政治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7]

事实上,不管这些考辨真实可信的程度有多少,这些学说只能解释古代一社群或社团的形成,而不能说明作为一思想学派的儒学的特性。^[8]“儒”虽然起源于殷商时代,但我们却不能说儒学也始于那时。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的那样,“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9],也就是说,孔子以前没有所谓经与经学。同样,“儒学”之成为一个学派,当然也只能始自孔子。孔子以前,没有儒学,当然也没有后世所谓的儒家。《汉书·艺文志》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认为“儒家”出自周代的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虽然儒家出于王官之说还有许多争论,并不可全信,但那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话却可谓一语中的。后世学者之所以认定儒学创立于孔子,盖因为孔子以“仁、义、礼”等概念为核心,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此为内在的、实质的体系,非为一外在的、形式的体系),并且为后人提供了一整套基本的为人处世的价值规范和修齐治平的指导原则,最终奠定了这一学派基本的思想学说和特有的文化精神。

然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长期成为古代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

儒学究竟有哪些思想特质呢？她最本质、最核心的精神又是什么呢？1927年，梁任公对儒学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10]明确用“内圣外王”一词来概括儒学的精神实质。

其后，现代新儒家之巨擘熊十力亦于1956年出版的《原儒》中明确指出“儒学总包内圣外王”，认为“《庄子·天下篇》以内圣外王称孔子，却是囊括大字，孔子与儒学之广大在此”^[11]，并期望“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来圣明之绪而集大成，开内圣外王一贯之鸿宗”。“内圣外王”一语遂逐渐成为现代新儒家所共认之价值准的。张东荪亦认为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论语》、《大学》、《中庸》与《孟子》这四种儒家经典所表现的思想。^[12]作为当代新儒家之执牛耳者，牟宗三便认为儒学是内圣外王本末一贯之道，^[13]并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出于《庄子·天下篇》，而以之表达儒家的心愿和理想最为恰当。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14]。也就是说，内圣是内在地成就自己，自觉地去道德实践以成理想的道德人格，外王是外在地成就事功，使王者之道遍行于天地之间；内圣为本，外王为末，本末一贯，不可偏废，可以说是抓住了儒学的本质。而冯友兰在《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的《绪论》）中亦说：“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又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又是使人成为圣人之道，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尽管现代新儒家如此认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内圣外王”一词却不见于先秦原始儒家，而是出自于《庄子》。《庄子·天下篇》将“内圣外王”之道提升至“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的高度，并认为其“小大精粗”具在于《诗》、《书》、《礼》、《乐》之中，而“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因而悲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

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应该说庄子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概括是较契合儒学的基本精神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内圣外王”一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得不到儒家的认同,直到宋代的理学家才开始谈论。^[15]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仅是由于儒家的“门户之见”,亦或许早期儒家们认为庄子的概括并不准确和严密。^[16]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除了“内圣外王”之外也确实无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汇来概括和表达儒学的学术文化精神。

有学者认为,最早使用该词来指称儒学的基本精神的儒家学者可能就是北宋的程颢。^[17]据《宋史·邵雍传》记载,程颢一日与邵雍论道,大快而归,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另见《河南程氏文集·传闻续记》:“……明日,明道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这可以说开了倡导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先河。因此,自北宋儒学复兴以后,特别是宋儒在“出入佛老数十载”,吸收了佛老的思想义理之精华后,便开始明确提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区别和抗衡佛老之学。

此后,谈论“内圣外王”的儒者就代不乏人。比如秦观有所谓“惟王道备天人,功崇列圣。大成既集,六艺斯明。内圣外王,所同宪法”^[18]。林之奇认为:“张横渠之《正蒙》书,发挥内圣外王之业者。”^[19]叶适谓“三代统纪,汉唐制度,百世虽远,事研于终,德复为词华,乃学之余。内圣外王,本末洪纤”^[20]。真德秀更有发挥,认为“孔门独一颜子为好学。颜子所问,前曰为仁,后曰为邦,舍是亡他学也。盖为仁者,成己之技,而为邦者,成物之极。体用本末,究乎此矣。颜子所以亚于圣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业,岂非内圣外王之学已备故邪?”^[21]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认为,“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如天覆地载,日月照而四时行,特位俭于德耳。中庸,内圣外王之道也,因二圣人明之”,又在《大学本旨》中认为,“是书也,一言以蔽之,曰仁。盖一贯,忠恕之全体,尽己尽物之全能,内圣外王之道也”。陈淳在《严陵讲义》中亦以内圣外王讲释四书,认为“至是而后言内圣外王之道,而致开